

“传教的物化”：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宗教与经济外交*

◎ 张玉友

内容提要：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撒哈拉问题一直是摩洛哥最为核心的国内政治议程和外交议题。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的周边外交是解决撒哈拉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具体而言，摩洛哥政府通过使用颇具伊斯兰特色的外交路径——宗教外交和经济外交并举，来实现对西撒哈拉地区的长期“事实占领”。研究发现，当摩洛哥同时运用宗教外交与经济外交两大路径时，通过“传教的物化”机制，两者会产生互补效应，最终实现核心政治目标。

关键词：传教的物化 西撒哈拉问题 宗教外交 经济外交 摩洛哥

作者简介：张玉友，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时，周边地区和域外大国是其外交实践的两大大重要对象。为获取对争议领土的实际控制权，“事实占领”（Fait Accompli）和武力收复（Coercion）是两种常用的策略。^① 一国政府为了维持“事实占领”^②的战果，往往会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广泛认可的同时，积极开展周边外交。

自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来，边界与领土争端是困扰这片大陆的主要问题之一。位于西北非的西撒哈拉地区至今还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是非洲大陆上最后一个“未解放的殖民地”^③，而对摩洛哥来说，西撒哈拉问题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领土争端。^④ 自从 1956 年独立以来，西撒哈拉问题便成为摩洛哥的“事实占领”之地，且在 1991 年以后，长期保持着和平状态。^⑤ 笔者认为，这得益于摩洛哥将一大部分外交资源投入周边地区——非洲，并开展了巧妙的外交实践，进而实现长期的“事实占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探讨摩洛哥如何对周边国家通过“传教的物化”机制——宗教和经济路径并举，以期实现核心的政治目标。

* 本文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摩洛哥国家治理的多维研究”（编号：21FGJB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Dan Altman, “By Fait Accompli, Not Coercion: How States Wrest Territory from Their Adversa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4, 2017, pp. 881–891.

② 根据学者统计，1918—2016 年，武力夺取有 13 次，“事实占领”有 112 次，最终进入战争状态的只有 27 次，其余均保持着某一程度的和平占领。参考：Dan Altman, “By Fait Accompli, Not Coercion: How States Wrest Territory from Their Adversa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4, 2017, pp. 881–891; 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The Politics and Geography of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Annex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53.

③ Emmanuel Nwafor Mordi, “The Western Sahara Conflict: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Reffrendum and Terrorism in Africa’s Last Conony, 1973–2013”, *Malaysian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 Strategy*, Vol. 42, No. 1, 2015, pp. 1–22.

④ Hammad Zouitini, “L’ Affaire du Sahara Marocian depuis L’ independence du Maroc”, in Abdelhak Azzouzi, dir., *Annuaire Marocain de la Stratégie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 Harmattan, 2013, pp. 271–289.

⑤ Andreu Solà -Martí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Western Sahara”, *African Journal on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9, No. 3, 2009, p. 121.

一、西撒哈拉问题、非洲战略与摩洛哥外交政策

纵观摩洛哥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西撒哈拉问题一直是其最为核心的政治议程，这表现为争取国际社会对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地区的合法拥有权，消除国际社会的“占领”叙事话语。在外交政策上，摩洛哥采取了“普遍撒网、重点突破”的策略，即在国际社会寻求普遍支持，继而对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重点游说。

摩洛哥西撒哈拉政策有两大特点：其一，立场的坚定性。摩洛哥始终坚持西撒哈拉地区是摩洛哥不可分割的领土，是摩洛哥的“南方省”；其二，意愿的不确定性。两任国王虽然将解决撒哈拉问题视作国家的“民族事业”，但似乎并没有意愿真正解决该问题，而是让其成为一个“事实占领”的悬而未决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和平担忧”（Fear of Peace）是一种缺乏政治理性的合理性行为。^①因此，这也决定了摩洛哥西撒哈拉问题的“目标性”和“工具性”属性。前者塑造了西撒哈拉问题在摩洛哥外交中的最高优先性；后者体现在摩洛哥政府获取外交行为的“合法性”上，如以西撒哈拉问题为理由驱逐国外大使、谴责他国的破坏行为等。

由于非洲国家历来是西撒哈拉问题解决的关键角色，所以摩洛哥一直将非洲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对象之一。1984年国王哈桑二世宣布退出非洲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前身）后，因摩洛哥和非盟之间的政治信任急速下降，联合国自此成为参与西撒哈拉问题解决的主要国际组织。^②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非洲陆续出现众多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RASD）的国家。除当时包括几内亚、加蓬、塞内加尔等几个一直支持摩洛哥的非洲国家外，摩洛哥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直线下滑。在对待西撒哈拉问题上，相对于阿尔及利亚争取非洲国家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政策，摩洛哥则寻求法国、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支持。^③然而，长期以来作为国际援助的接收国，摩洛哥也遭受着诸多援助国施加的政治条件，如西方国家一直以来的民主化改革要求，沙特和阿联酋在卡塔尔危机、伊朗问题上的“选边站”压力。

因此，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除了继续争取传统盟友支持外，加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关系开始成为其一项新的国策。2000年，在非洲—欧盟峰会上，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取消非洲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④从这一年起至2017年1月30日摩洛哥重返非盟这17年里，摩洛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关系的发展经历了马拉松式的长跑。摩洛哥赢得这场长跑“胜利”的两大核心手段，则是“援助式外交”工具——宗教外交和经济外交。

二、宗教外交：文化纽带与软实力的重塑

2013年，穆罕默德六世在访问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发表演讲时正式确定了宗教外交是对非政策的一大支柱。^⑤宗教外交是摩洛哥加强与非洲文化纽带以及开展软实力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Irene Fernández-Molina, *Moroccan Foreign Policy under Mohammed VI, 1999 - 2014*,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57; 摩洛哥有部分学者认为，西撒哈拉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缺乏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愿。

② Yahia H. Zoubir and Anthony G. Pazzanita, "The United Nations' Failure in Resolving the Western Sahara conflict",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1995, pp. 614-628.

③ Yahia H. Zoubir, "Algerian-Moroccan Rel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Maghribi Integratio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3, 2000, pp. 43-74.

④ Pierre Afouda Adimi, "Nouvelle Offensive Diplomatique Du Maroc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 Quel Regard?" *Paix et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s - Revue Maroco-Espagnoles de Droit Internal 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No. 3, Janvier-Décembre 2015, pp. 109-124.

⑤ Pierre Nivessel, "La diplomatie religieuse, porte d'entrée du Maroc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 *L'orient le Jour*, 22 August 2017, <https://www.lorientlejour.com/article/1068506/la-diplomatie-religieuse-porte-dentree-du-maroc-en-afrique-subsaharienne.html>.

（阅读时间：2018年4月27日）

(一) 宗教外交的条件：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宗教政策输出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输出。摩洛哥能在西非地区顺利推广其伊斯兰模式，重要原因在于摩洛哥与该地区亲密的历史联系。

第一，历史上，摩洛哥是连接北非、欧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商贸往来的核心过境地带，频繁的贸易往来为早期的宗教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第二，穆拉比特王朝时期第一位苏丹尤素福·伊本·塔什芬（Yousuf Ibn Tashfin）所在部落桑哈贾（Sanhaja）起源于毛里塔尼亚境内，这增强了双方共同的历史记忆；第三，现代摩洛哥国王作为“信士的长官（amir al-mu'minin）”^①拉近了其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穆斯林信众之间的宗教情感，这些穆斯林信众甚至视摩洛哥国王为他们的精神领袖。^②第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众多苏非派提加尼教团（Tijâniyyah）信徒，该教团由艾哈迈德·提加尼（Ahmad Tijâni）于1765年创立于摩洛哥古都非斯，跨国共同信仰增加了摩洛哥与上述国家间的宗教联系。^③

(二) 摩洛哥“中道”伊斯兰模式

摩洛哥的宗教外交是国内宗教机构改革的对外延伸。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卡萨布兰卡恐怖袭击后，摩洛哥开启了国内宗教机构改革，其核心目的是阻止萨拉菲主义在摩洛哥的传播。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制度层面，国王新任命苏非派的艾哈迈德·图菲克（Ahmed Toufiq）代替亲瓦哈比主义的阿德代尔凯比尔·阿洛维·穆达厄里（Addelkebir Alaoui M'daghri）为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大臣，进而领导重组宗教学者委员会、修改学校宗教课程、设立宗教电台和电视台。^④另外，摩洛哥还设立了国家资助的宗教学者或者领袖培训机构，因首次在阿拉伯国家中引入女性宗教领袖的职位——“女性训导师”（Mourchida），摩洛哥的伊玛目培训项目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⑤其二，在宗教学层面，重构摩洛哥的“宗教模式”，即宗教理念的现代化。根据摩洛哥宗教政策，其伊斯兰模式，在整体上隶属于逊尼派，在教法上属于马利克派，在教义上属于艾什尔里学派（Ash'ari），同时融合了苏非派思想。

摩洛哥伊斯兰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重视发展受西方国家支持的苏非主义，起初是为应对国内的政治活动分子，而后逐渐成为摩洛哥作为温和伊斯兰国家的重要特征，^⑥如宗教基金与伊

① 在摩洛哥1962年宪法中，“信士的长官”一词就作为国王的宗教身份被写入其中。20世纪60年代初，哈桑二世根据其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的历史传说，出于构建统治合法性的需求，遂将“信士的长官”一词制度化，同时具有政治性功能和宗教性功能，也即合法统治国家和动员所有与伊斯兰的相关的思想、机构和人员。Malika Zeghal, *Les Islamistes marocains: le défi à la monarchi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5, pp. 9-11.

② Alain Antil, “Le Maroc et sa ‘nouvelle frontière’: Lecture Critique du Versant Économique de la Stratégie Africaine du Maroc”, Notes de l'Ifri, Paris, février 2010, p. 19.

③ Jean Schmitz, “L' Islam en Afrique de l' Ouest: les méridiens et les parallèles, Afrique Noire et Monde Arabe: Continuité et Ruptures”, Éditions de L'Aube-IRD, 2000, p. 13.

④ Driss Maghraoui, “The Strengths and Limits of Religious Reforms in Morocco”,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4, No. 2, 2009, pp. 195-211.

⑤ Mohammed El-Katiri,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Religious Reform in Morocco”,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8, No. 1, 2013, pp. 57; Ann Marie Wainscott, “Religious Regulation as Foreign Policy: Morocco's Islamic Diplomacy in West Africa”, *Politics and Religion*, Vol. 11, No. 1, 2018, p. 7.

⑥ Fait Muedini, *Sponsoring Sufism: How Governments Promote “Mystical Islam” in Their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New York: Macmillan, 2015, pp. 68-95; Vincent J. Cornell, *Realm of the Saint: Power and Authority in Moroccan Sufi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斯兰事务部大臣图菲克就属于苏非派中的布达什沙教团 (*Butshishiyya*)。最后一个特点是，摩洛哥宗教部大力推广《古兰经》的瓦阿什 (*Warsh*) 读法，抛弃海湾阿拉伯国家常用且有瓦哈比元素的哈福斯 (*Hafs*) 读法。

(三) 宗教外交的路径与特征

从宪法来看，国王是摩洛哥伊斯兰教的唯一最高代表，任何重大宗教决定均由国王裁决，对外方面，宗教外交由国王进行决策，其他包括政治和宗教精英在内的官员只能代表国王。哈桑二世被认为是摩洛哥现代伊斯兰的第一代设计者，但总体上属于保守伊斯兰主义者，而穆罕默德六世则是更加现代化、自由主义和符合西方偏好的第二代伊斯兰设计者。^① 在宗教领域，代表国王进行宗教外交的官员主要由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大臣图菲克负责。因此，在几乎每一次国王出访撒哈拉以南非洲时，图菲克一般是除经济领域外最重要的随团官员。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和图菲克可以说是摩洛哥在非洲的宗教外交设计者、代表者和践行者。

2015年开始，为积极推广摩洛哥“中道”伊斯兰模式，在国王的设计和支持下，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设立了两个机构，分别为2015年3月27日建立的穆罕默德六世伊玛目与训导师学院 (*Mohammed VI Institute for the Training of Imams, Mourchidin and Mourchidat*，下文简称“穆罕默德六世学院”^②) 和2015年7月13日成立的穆罕默德六世非洲乌里玛基金会 (*Mohammed VI Foundation of African Ulemas*，下文简称“穆罕默德六世基金会”)。^③ 值得注意的是，“穆罕默德六世学院”自成立之日起，就设立了“国际项目”招收国外学生，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学生。

表1 “穆罕默德六世学院”2015年和2016年度接受的部分海外学生数量

国家	2015	2016	总数
马里	212	65	277
突尼斯	37	0	37
几内亚	116	99	215
科特迪瓦	75	99	174
法国	10	33	43
尼日尼亚	0	48	48

数据来源：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网站，^④ 笔者自制。

从表1可以看出，马里的伊玛目与训导师学生人数最多。2013年为应对马里国内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马里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 (*Ibrahim Boubacar Keita*) 与摩洛

① Abdessamad Belhaj, *La dimension islamique dans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Maroc: déterminants, acteurs, orientations*, Louvain: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2009, pp. 101.

② “穆罕默德六世学院”的设立规范了伊玛目、训导师 (包括女性) 和精神指导员 (包括女性) 的培训，其核心目标是给新一代的伊玛目和训导师灌输温和和伊斯兰思想，保护摩洛哥免受伊斯兰极端思想影响。

③ Cédric Bayloq et Aziz Hlaoua, “Diffuser un ‘Islam du Juste Milieu’ ?” *Afrique Contemporaine*, N° 257, 2016, pp. 113-117.

④ “SM le Roi, Amir Al Mouminine, inaugure à Rabat l’ Institut Mohammed VI de formation des Imams, morchidines et morchidates”, *Ministere des Habous et des affaires islamiques*, 27 Mars 2015, <http://www.habous.gov.ma/fr/islam-au-maroc/2647-sm-le-roi,-amir-al-mouminine,-inaugure-`-rabat-l'institut-mohammed-vi-de-formation-des-imams,-morchidines-et-morchidates.html>; “Institut Mohammed VI de formation des Imams prédicateurs et des prédicatrices”, *Ministere des Habous et des affaires islamiques*, 21 September 2015, <http://www.habous.gov.ma/fr/formation-et-qualification.html>. (阅读时间：2018年4月27日)

哥签署了伊玛目与训导师培训协议，计划分阶段培训 500 名伊玛目。^① 也是从这一协议开始，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西非国家开始将摩洛哥的“中道”伊斯兰模式作为抵御伊斯兰极端思想的重要学习对象。

除了伊玛目与训导师培训项目外，在“穆罕默德六世学院”成立后不到四个月设立的“穆罕默德六世基金会”既是前者的补充，也充分彰显了摩洛哥意欲全面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群体的联系。^② 从成立的 7 条宗旨看，该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和团结摩洛哥与非洲国家的宗教联系。^③ 穆罕默德六世亲自担任基金会主席，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大臣图菲克担任副主席，并全权代表国王管理该基金会。2016 年，穆罕默德六世为基金会成立了“高级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 30 个非洲国家的 120 名宗教学者组成，其中女性 17 名，摩洛哥籍有 20 名。^④ 通过该基金会，摩洛哥国王可以与非洲各国的宗教领袖建立直接联系，从而达到影响各国政策的目的。^⑤ 穆罕默德六世学院与基金会如今已经成为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非洲地区推广其本人以及摩洛哥国家形象的两大支柱性机制。

同时，摩洛哥宗教外交还有两个重要路径：第一，国王出访和演讲。2000—2021 年，穆罕默德六世已经对 26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超过 60 次的正式访问。摩洛哥国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访问，不同于一般首脑访问，其还对对该地区的穆斯林群体有“精神慰问”的功能，而演讲更是传播摩洛哥伊斯兰模式的重要方式；第二，资助建设清真寺。穆罕默德六世在出访穆斯林占多数的非洲国家时，一般会资助当地建立清真寺。如 2016 年国王在出访时，分别资助坦桑尼亚、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建立“穆罕默德六世清真寺”。^⑥ 资助建立清真一方面可以增加两国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与当地穆斯林建立直接联系。

三、经济外交：投资性援助

（一）经济外交的条件

摩洛哥对非洲经济外交主要是基于地缘经济动因。首先，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西方国家推动的“结构调整”以来，摩洛哥一方面加大对欧美的经济开放，另一方面，摩洛哥企业也加快了私有化进程。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摩洛哥的企业制度也达到了国际标准，形成了一批优秀的企业。^⑦ 但是，从摩洛哥国内经济来看，由于国内市场小，加上近 10 年来市场趋于饱和，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摩洛哥资本向外流动的原动力。

① “Mali: Mohammed VI et IBK lancent deux projets de cooperation”, *Ifi Afrique*, 21 Septembre 2013, <http://www.rfi.fr/afrrique/20130921-mali-mohamed-vi-ibk-lancent-deux-projets-cooperation-maroc-imams>. (阅读时间：2018 年 4 月 28 日)

② Cédric Bayloq et Aziz Hlaoua, “Diffuser un ‘Islam du Juste Milieu’ ?” *Afrique Contemporaine*, n° 257, 2016, p. 118.

③ “Fondation Mohammed VI des Oulémas africains”, *Ministere des Habous et des affaires islamiques*, 12 Sempber 2015, <http://www.habous.gov.ma/fr/fondation-mohammed-vi-des-oul%C3%A9mas-africains.html>. (阅读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④ 30 个非洲国家分别为：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中非共和国、乍得、塞内加尔、苏丹、索马里、多哥、加蓬、喀麦隆、科特迪瓦、尼日尔、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喀麦隆、南非、吉布提、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塞拉利昂、赞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刚果（金）、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

⑤ Marie Waincott, “Religious Regulation as Foreign Policy: Morocco’s Islamic Diplomacy in West Africa”, *Politics and Religion*, Vol. 11, No. 1, 2018, p. 11.

⑥ Margaux Mazellier, “Diplomatie religieuse: 300 oulémas africains à Fès pour promouvoir un islam du “juste milieu””, *Telquel*, Décembre 06 2017, http://telquel.ma/2017/12/06/diplomatie-religieuse-300-oulemas-africains-a-fes-pour-promouvoir-un-islam-du-juste-milieu_1571897. (阅读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⑦ 参考：Guilain P. Denooux and Abdeslam Maghraou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Morocco”,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Africa*, London: Praeger, 1998.

其次，过去 15 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改变了摩洛哥政治和经济精英对该地区的既有认知。自 2003 年以来，该地区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 5%，而在一些西非国家，如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刚果（金）、塞拉利昂等国，甚至达到了 6%。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伴随着中产阶级数量大增，据非洲发展银行报告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产阶级数量从 1999 年的 1.57 亿增至 2010 年的 3.26 亿，从而也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①

最后，由于长期以来，摩洛哥对欧洲经济的高度依赖，而后者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会影响到摩洛哥，因此通过加强与经济高速发展地区的纽带可以推进国家的经济多元化。^② 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是国与国之间经贸合作存在“互惠互利”情况下的外溢效应。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外交也是建立在谋取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对称性”经济关系，对该地区，尤其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形成经济影响力，进而为谋求政治利益服务。

（二）王室主导下的经济外交

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在出访次数上，要数非洲国家最多，穆罕默德六世与非洲诸多国家的大家族或领导人都有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如加蓬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Ali-Ben Bongo Ondimba）就是其年轻时的朋友；^③ 从国王的演讲内容中可以发现，其已经形成了一套“以非洲为中心”的外交话语，如“非洲必须要相信非洲”“相对援助，非洲更需要合作伙伴”^④ “从今天开始，非洲代表未来”^⑤ 等。因此，在国王“信息传递”下，从摩洛哥政府到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社会智库形成了一股“摩洛哥与非洲关系”研究热，而国王的非洲政策，也被称之为“非洲战略”。^⑥

因此，非洲经济外交从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王室的事务”。经济外交的（主）要形式是在国王的出访过程中签署各类协议，主要包括投资、贸易、教育、科技、文化和宗教等领域。2000—2016 年，摩洛哥与超过 40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 600 多个合作协议。^⑦ 协议签署完成后，由摩洛哥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统筹，各部门配合进行具体实施和执行。此外，王室主导下的经济外交还体现在穆罕默德六世对话语权的掌控，如为了体现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他提出了“外交服务于经济”的理念。在 2014 年摩洛哥—科特迪瓦经济发展论坛上，穆罕默德六世在演讲中提到：“过去，外交都是为加强政治关系，而从今天开始经济合作将成为（摩洛哥）外交的重要服务对象之一。”^⑧

① Mohammed EL-Katiri, *From Assistance to Partnership: Morocco and Its Foreign Policy in West Afric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5, pp. 7-9.

② Ibid., p. 9.

③ Fahd Iraqi, “Maroc: Les amis du roi”, *Jeune Afrique*, N° 2986, 7 Avril 2018, pp. 42-46.

④ Lélia Rousselet, *La Stratégie Africaine du Maroc: Un Nouveau Rôle pour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Marocaine?*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Européennes, 2016, p. 50.

⑤ 穆罕默德六世在第 64 届“国王与人民革命日”演讲，<http://www.maroc.ma/en/royal-speeches/hm-king-delivers-speech-nation-64th-revolution-king-and-people>.（阅读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⑥ Lélia Rousselet, *La Stratégie Africaine du Maroc: Un Nouveau Rôle pour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Marocaine?*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Européennes, 2016, pp. 1-30.

⑦ Zakari Younés et Abou El Farah Yahia, “La politique africaine du Maroc: Caractéristiques, Acteurs et Enjeux”, in Mohammed Derouiche dir., *Maroc-Afrique: Success-Story*, Fikr, 2014, p. 79.

⑧ 穆罕默德六世 2014 年 2 月 14 日在摩洛哥—科特迪瓦论坛上演讲，<http://www.maroc.ma/fr/discours-royaux/texte-integral-du-discours-de-sm-le-roi-au-forum-economique-maroco-ivoirien-abidjan>, 2018-10-16.（阅读时间：2021 年 3 月 4 日）

(三) 经济外交的路径与特征

经济合作的结构特征决定着经济外交的具体方向和实施路径。摩洛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合作有如下两大特征：

第一，贸易总量小。2003—2016年，摩洛哥与撒哈拉以南地区贸易总量保持稳定增长，2010年和2015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12.8%，2008年至2016年也有9.1%的增长率，其中2016年的贸易总量达到119亿迪拉姆（约10.48亿欧元）。^①然而，相较于摩洛哥传统贸易伙伴欧盟，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总量比重非常小，2015年与欧洲贸易占比多达56.7%，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占3.4%，最高峰的2014年也只有4.4%。^②值得注意的是，摩洛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属于“非对称性”关系，如2009年其从该地区的进口占比不到1%，2010至2014年间还出现了连续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摩洛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具有较高的国际贸易成本，如物流便利性差。^③

第二，合作方式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1984年退出非盟后，由于摩洛哥不能在非盟框架内开展经贸合作，所以只能寻求加强双边关系，同时试图加入非洲地区性组织以加强多边合作。

在“弱多边、弱贸易”的特征下，摩洛哥选择了更为擅长的双边投资，即在双边经济合作中，投资是主要的合作形式。由于摩洛哥企业，尤其是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领域在西方主导下的自由化改革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国际投资经验。因此，在早期摩洛哥对非投资战略中，商业银行是践行国家对外投资战略的先行者，主要有瓦法银行（Attijariwafa Bank）、摩洛哥外贸银行（BMCE）和中央人民银行（BCP）。随着银行业在非洲的成功，摩洛哥其他国家大型企业（*Champions Nationales*）也纷纷加入。^④这一波“走出去”的企业涉及领域较广，包括农业、房地产、医药、基础设施建设、矿业等。就类型来说，主要有两类，“王室拥有的企业”（Royal-Owned）和“公共企业”（Public Enterprises）。

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摩洛哥企业主要以西非法语区为基地通过在当地国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领域，如银行、电信、保险、控股和工业等。^⑤2012年，瓦法银行已经在西非和中非地区的11个国家有分支，中央人民银行也在7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其他服务业、能源和矿业也均在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子公司。

表2 摩洛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占比（%）

时间	西非	东非	中非	南部非洲
贸易（2016）	58.2%	15.5%	12.4%	13.4%
投资（2011-2015）	64.7%	10%	25.3%	无

数据来源：摩洛哥外汇管理局（Office des Changes），笔者自制。

① “Echange Maroc-Afrique Subsaharienne”，*Office Des Changes*, 2017, Rabat.

② Ibid. “Relations Maroc-Afrique: l’ambition d’une nouvelle frontière”，*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2014, p. 11.

③ Rim Berahab, “Relations between Morocco and sub-Saharan Africa: What is the potential for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CP Policy Center, February 2017, pp. 1-10.

④ Mohammed EL-Katiri, From Assistance to Partnership: Morocco and Its Foreign Policy in West Afric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5, pp. 10-12.

⑤ “Echange Maroc-Afrique Subsaharienne”，*Office Des Changes*, 2017, Rabat.

从表 2 也可以看出，从摩洛哥当前贸易往来和投资去向来看，主要集中在西非地区，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到 20%。从 2016 年开始，摩洛哥对非投资进入新一波浪潮，主要体现在从“舒适”的西非和中非，扩展至东非和南部非洲。新一波扩张浪潮的标志性事件是，摩洛哥在 2016 年 7 月宣布准备重返非盟。也是从 2016 年 7 月伊始，摩洛哥国王就开始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8 个“盲点国家”进行了历史上首次访问。^① 因此，以投资为手段的经济外交实际上是服务于摩洛哥的整体外交战略。

四、“传教的物化”：宗教与经济的互补效应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两种外交路径——宗教外交和经济外交，实质上是现代国际发展援助雏形的另类应用。现代国际发展援助发展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1951 年间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其目的是帮助欧洲渡过经济危机，从而防止苏联共产主义对欧洲的渗透。4 年计划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开始对“欠发达国家”伸出“援手”。^② 事实上，从冷战时期至今，虽然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在援助领域、渠道和管理上发生的诸多变化，^③ 但是其内核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即显性的人道主义发展和隐性的国家利益追求。

根据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观点，追求国家利益是一国政府开展外交实践的终极目标。而具有西方现代文明特色的人道主义发展理念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哲学辩论：从奥卡姆发展的哲学唯名论 (Nominalism) 到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 (Humanism)，再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最后发展成理性主义的科学实证思想。进入 15 世纪后，欧洲的现代文明建设已基本完成。欧洲殖民者开始将这种文明带到他们眼中的“未开化的非洲” (Uncivilized African)。^④ 起初，传教是欧洲殖民者打开非洲市场所依赖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于处于前现代化的非洲人民来说，单一的传教活动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欧洲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将当时先进的医疗、卫生等理念也传到了非洲，对传教活动进行了“物化处理”，使得当地人民真正信任了宗教为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⑤

事实上，现代国际援助体系的学术谱系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以前出现的“传教的物化”实践，其通过发展理念——物质性和人文主义——传教活动构建起了追求国家利益的两大基石。从摩洛哥案例来看，该国政府为了追求核心的政治目标——和平地维持“事实占领”，近年来一直践行着宗教外交与经济外交并举的政策。^⑥ 因此，这一观点也符合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援助式外交的逻辑——“传教的物化”。

基于这一逻辑，摩洛哥宗教外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接受程度如此之高，除了上文所述的历史与文化联系，还与摩洛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活跃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⑦ 经济

① 主要集中在东非和部分西非以及南部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坦桑尼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赞比亚、尼日尼亚和加纳等国，共签署了 113 个协议，主要涉及银行、农业、新能源、矿业、旅游和物流。参考：Nadia Lamlili, “Maroc-Afrique : la diplomatie économique de Mohammed VI”, *Jeune Afrique*, 23 février 2017, <http://www.jeuneafrique.com/406029/politique/maroc-diplomatie-chequier-de-mohammed-vi-nouveaux-amis-africains/>. (阅读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② 唐丽霞、李小云：《国家发展援助体系的演变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7 期。

③ 唐丽霞、李小云：《西方发展援助的管理和实践评述》，《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6 年第 2 期。

④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⑤ 该观点引自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做题为“国际发展的学术谱系”的讲座内容。

⑥ 笔者曾于 2018 年 3—6 月在摩洛哥采访了多位来自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蓬等国的伊玛目，他们认为，摩洛哥在这些国家的宗教推广不受排斥的原因在于摩洛哥人道主义关怀及其在当地的投资。

⑦ Marie Waincott, “Religious Regulation as Foreign Policy: Morocco’s Islamic Diplomacy in West Africa”, *Politics and Religion*, Vol. 11, No. 1, 2018, pp. 12–18.

合作事关民生之事，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最为关心的事，因此摩洛哥对该地区的经济外交既是经济上的“双赢”之策，也是与宗教外交进行完美配合的外交工具，可以形成完美的互补效应。

从互补效应的实际成效来看，自1999年以来，摩洛哥一直保持着对西撒哈拉地区稳健的“事实占领”。同时，随着2016年以来摩洛哥加大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宗教和经济投入，一些反摩的非洲国家如南非、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开始转变对摩洛哥态度，这也是促使了2017年摩洛哥能够成功重返非盟及成为非盟安全与和平理事会成员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开启的两轮摩洛哥、“波利萨里奥阵线”、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四方会谈，也证明了摩洛哥周边外交的成功。

五、结语

“事实占领”是较强国家（相对较弱对手）收复争议领土的常用方式之一。但一国政府如何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事实占领”的战果，既是国家外交实践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探讨实现外交与政治目标的学术问题。本文通过案例考察发现，摩洛哥的周边外交践行了国际发展援助理念中“传教的物化”，即通过宗教和经济并举的方式，追求政治目标。摩洛哥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政策——宗教和经济外交，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仅提升了国家形象，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政治收益。2020年12月，自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主权以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科特迪瓦和加蓬等非洲国家表明支持这一举措，并在西撒哈拉的达赫拉和拉尤恩开设外交代表处。概而言之，摩洛哥在非洲取得的政治影响力离不开宗教与经济外交的组合效应。

（责任编辑 王皓月）